

要让“下水道”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与目前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相比,我国城市在“下水道”的建设上是严重滞后的,这不仅会为未来的城市运行带来巨大的隐患,造成巨大的经济和财富损失,并且有可能使城市化建设的成果付之东流。

■ 丁是钉

大自然正在用暴雨这种形式检验着中国的城市建设质量。

60多亿元,这是一场暴雨给北京房产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是许多企业眼中巨大的商业机会。在各种工程建设投入用来进行城市防灾和减灾建设,项目减少的大背景下,这样大体量的灾后重建项目自然会成为企业争夺的对象。

尽管灾后重建也会创造新的商业和就业机会,拉动GDP的增长,但是,任何这种巨大的灾害都意味着经济、财富受损甚至是生命的牺牲。如果转变一下思路,把灾后重建的巨额资金投入用来进行城市防灾和减灾建设上,那将创造继“铁公基”之后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一场暴雨之所以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灾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北京包括“下水道”在内的防灾减灾设施不给力。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在小浪底等地考察时就指出,要汲取教训,提高城市的排涝能力。

发达国家对“下水道”的重视折射我们的落后现状

与发达国家的大都市相比,北京的排涝能力有着巨大的差距,北京包括“下水道”在内的排涝防洪设施,与其国际化大都市的形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北京对于排涝防洪的实际需要,成为了制约北京发展的瓶颈以及威胁北京安全的“风险点”。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除了北京建设发展初期经济支付能力不足的原因外,更多是建设理念上发生了错位。“重地上,轻地下;重形象,轻实用;重

表面,轻内涵”的陈旧建设理念以灾难的方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发达国家对于“下水道”建设的重视程度,可以折射出我们在此方面的落后现状。根据于果原著改编的电影《悲惨世界》讲述的是距今已经有150多年历史的故事,但影片中的下水道却宽敞得可以通过卡车,比我国许多城市当今的下水道建设水平还要好。从这个角度看,我国城市的下水道建设至少落后了150年。

发达国家在“下水道”建设上的系统性和超前性对于我国城市建设具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

德国人素来重视城市规划,严谨的德国式规划非常具有前瞻性。从1873年兴建第一条下水道开始,承建公司根据柏林市政府的要求便考虑了柏林未来80至100年的城市发展规模,到今天在柏林900平方公里土地上地下排水管道已长达9500千米,相当于从柏林到北京的距离。与此同时,柏林地下的管道设施十分宽阔,允许施工人员进行作业车直接开进管道中进行勘察和修缮。而在相对狭窄的管道中也可用工程机械进行勘探和维修。

巴黎地下排水系统规模庞大,设计合理,建设有序,一直以来是世界多国学习的典范,骄傲的巴黎人甚至还将下水道的一截开发成了博物馆。巴黎的下水道均处在巴黎市地面以下50米,总长2347公里,规模远超巴黎地铁,每天有120亿立方米的水经此净化排出。能够成为博物馆的巴黎下水道有通畅的排气系统,有纯净空气,不会臭气熏天。为了方便下水道清洁工作,每条下水道都标上了与地面街道对应的名称——只要熟悉巴黎街道,就不会在这个“迷宫”里迷路。这样的市政工程,虽然初期投资相当巨大,

但是在后期的使用过程中却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任何一条管线泄漏、短路或者其他故障,工人都可以随时进入地下维修。

日本从上世纪70年代起对“下水道”进行系统化改造,除了建设骨干排水系统外,日本还开发了雨水蓄滞、雨水渗透等新技术,用经过过滤以后清水回补地下水。位于东京外围埼玉县春日部市的“东京外围排水系统”深埋地下50多米,全长6.3公里。系统由五个巨大的圆柱形蓄水坑,宽度达10米的输水管道以及更为巨大的“调压水槽”构成。“调压水槽”是一个由59根巨型大柱子撑起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面积达13806平方米。最近刚落成的日本最高塔——东京天空树的蓄水坑能储存7000吨雨水,可供其所在的东京墨田区23万人使用一天。主要用做灾害发生时的生活用水或消防用水。

2010年,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启动一项名为“绿色基础设施计划”的市政工程。这项计划包括利用高压喷射水枪清洁充满油垢的下水道以及吸走下水道的碎石和泥沙。今年3月,纽约市政府宣布将投入20多亿美元,开发新的环境技术,阻止污水流入河中。纽约确定在未来3年内投资1.87亿美元以及预计在未来18年内投入24亿美元,用以安装绿色设施,包括多孔渗水的人行道和能够截留雨水的绿色屋顶。

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下水道”经济是不错的选择

客观上讲,这些国际化都市的“下水道”建设有的也曾走过一些弯路。相比这些国际大都市,我国正处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完全可以利用后发优势,

直接学习发达国家最先进的“下水道”建设经验和方式,避免因“走弯路”而造成的经济和时间损失。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下行通道之中,在传统产业中,产能过剩已经从钢铁、电解铝、水泥和汽车行业,扩展到焦炭、电石、铁合金、铜冶炼、纺织、化纤等行业。1—5月份,全国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同比下降2.4%,其中,国有企业同比下降10.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同比增长78.2%,亏损面同比增长23.1%。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上半年我国的GDP增长速度已经下降到7.8%,尽管这是国家进行主动性调控的结果,并且依然是一个比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是防止经济增速大幅度下滑,特别是防止经济由主动调控向资源约束性下滑转变,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必须面对的考题。7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着力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难题,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改变当前内需不足以及经济增长乏力的现状,对于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是至关重要的。与目前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相比,我国城市在“下水道”建设上是严重滞后的,这不仅会为未来的城市运行带来巨大的隐患,造成巨大的经济和财富损失,并且有可能使城市化建设的成果付之东流。

以“下水道”为代表的城市防灾和减灾体系建设,建设体量巨大,并且涉及钢铁、水泥等很多相关产业,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非常显著,并且能够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硬件基础,防止和减轻自然灾害对于城市的破坏。因此,城市“下水道”建设完全有理由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先富国还是先富民 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争



（上接第一版）

“国富民穷”是重税造成的

推动国富民穷的重要手段是收税。从某种意义上说,税收加重的程度便是国富民穷加剧的程度。

在一定程度上,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是高税收政策的结果。高税收是造成高通胀的成因之一,因为我国的税收以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流转税(间接税)为主,而西方国家以个税、房产税、遗产税等直接税为主,这样只要商品进入中国流通,就要面临层层加税,做实体经济的企业不得不把这部分税收摊薄到成本之中,致使中国的物价甚至高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所以中国财政收入递增速度越快,我国的物价调控难度就越大。

居民承受的更大税负是包括在商品价格中的各种隐形税,人民感觉不到,但每时每刻都在缴纳。经济学家孙立平在《当前中国的贫富格局》中曾有这样的统计:“一袋价格为2元的盐,包含大约0.29元的消费税和0.33元的城建税;一瓶3元的啤酒包含大约0.44元的增值税、0.12元的消费税和0.06元的城建税;如果你吸烟,一包8元的香烟包含4.70元的消费税、增值税和城建税。”这个单子并不完全,购物的价格中还有教育附加费等等种税费。还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每100元比萨饼中便有22元的税,每100元化

妆品中有44元的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很多不明就里的人把怨恨转移到企业身上。有些企业总想压低工资,甚至欠薪,很多老板的确实有能力提高工资。这一方面是许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和出口企业,没有核心技术和品牌,只能贴牌生产,利润大多让拥有核心技术和品牌的洋人拿走了,没有能力提高工人工资;另一方面则是在剩下的少得可怜的利润中,有相当一部分要拿去缴税。

目前的中国,减税的呼声很高,包括税务部门亦是如此。但是改革税制,付诸实现的可能性几乎是痴人说梦。我们实难相信。因为国家需要钱的地方太多,随着经济发展,我们还要使税收不断增加。我们要按巨资修建或有效益或无效益的高铁、机场,各地政府还要兴办种种有益或无益的政绩工程,“三公”支出难以大幅度减少,甚至还要高速增长,作为政府财政筹资的国税总局,不增加税收,又有什么办法呢?国税总局领导是在其位谋其政,不该受到指责。问题出在哪?出在顶层设计上,政府什么事都要办,办企业、修铁路,什么都是政府出面来办,根子不在哪一个人身上,还是在政府的指导思想上。

强国富民先后,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争

我们的一些现行制度设计是由计划经济思想主导,以凯恩斯的政府投资刺激理论为基础的。改革30多年来,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20年来,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上层建筑的改革没有跟上。这是造成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不适于市场经济的各种制度思想与体制仍然顽强存在。我们的各种制度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设计的。现在经济体制已经变为市场经济,但以计划经济为基础建立的政治制度仍然变化不大,或者说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是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现在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不变行吗?胡锦涛总书记最近的讲话中强调了改革,在体制改革中把富民放在中心位置,富民才有希望,才是可望且可即的。

问题是现行税收制度的出发点和目的仍然脱离富国的中心。要强国富民,国家必须有钱,而国家有钱就得靠增税。这正是我们从内心里强调增加税收的思想基础。富国与富民从根

本上说并不矛盾,但对两者的顺序认识并不相同。有人认为是先富国而后才能富民,有人认为是先富民而后才能富国。计划经济的思路是前者,市场经济的思路是后者。我们在30多年的改革中,目标是市场经济,但思路仍然是先富国后富民,所以才有GDP的年平均增长近10%,而税收增加在30%以上,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改变这种思路。从党中央把“十二五”期间的目标确定为富民来看,思路已经得到根本性转变。

看来,富民的思路还是刚刚提出,到一系列的制度来落实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实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围绕党中央的新思路改变相应的制度。其中重要的,就是分配制度的改革,重要的是税收体制的改革。提高个税起征点仅仅是税收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对税收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尤其是对企业进行大规模减税,富民才能圆梦。当然,减少税收要以控制政府的支出为基础。没有支出的减少,减税仍然只能是一个“承诺”而已。

怎么实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核心是政府的转型。要从“建设财政”转向“公共财政”。现在,政府没有理由再聚敛那么多的钱,尤其是在当前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和中国宏观经济严峻格局中,政府更没有必要再大幅度地增加税收了。

这里提出了一个结论,如果思想上停留在计划经济阶段,用计划经济的思路来治国理政,必然需要一个富裕政府,而且政府越富,钱越不够花,我们的问题出在我们的根本思路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上,历史在这里没有前进,几乎在倒退。

15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透过“分配问题”的迷雾,看清拉萨尔抛开所有制的本质。我们今天则应再次透过“分配问题”的迷雾看清坚持计划经济需要依靠强势政府投资刺激的本质,我们的屁股不能总是坐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宝座上。

为什么民穷国也穷

我们总是说国富民穷,可是政府官员总是认为钱不够花,甚至认为政府很穷。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位教授做过研究,从乾隆三十年(1766年)一直到现在,整个清代政府税收,平均每个国民负担不超过10斤米。现在我们的税收有8.9万亿元,2012年超过

10万亿元是肯定无疑的了。就是说,每个国民负担7000元钱,这还不算税外的各种费。如果加上所谓的“第二财政”,差不多每个中国人就摊到1万块钱了,这比每个中国人现在的平均可支配收入还高。全国平均每个人要上缴万元税费,政府每年的财政这么大,还在增税,这多可怕!

减税是当务之急,并不意味着减税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当前的“国富民穷”,直接原因在税收或者分配,根子却不在财富分配上。如果“理性看待”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可以看到,相当部分的财政收入是“花”在了赤字和地方债上。但假若据此认为财政收入其实仍处于拮据的状态,这结果实在有些荒谬:做了一个大蛋糕,却出现了“国富民穷”的场景。这悖论也说明,财政收入虚高并不是数字显示的那么简单。之所以减税迟迟难下决心,也正是因为分配之外的原因。收入分配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制度体系,其中蕴涵着经济体制的深层次问题。

从减税出发,既可以富民又可以强国

富国在先的政策取向和重税政策,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现在的财税获取财政收入的功能最突出,而对社会贫富差距的调节作用几乎等于零。否则中国社会就不会这么快的“两极分化”。当前基尼系数达到0.47,跟不合理的税制直接相关。以往的财税改革注重追求税收的效率,认为多收就好,就是政绩,而对如何体现税制的公平性重视不够。这与税收的收益原则和支付能力原则根本相违背,大规模生产能力过剩情况下,减税富民才是最有效的宏观经济计划。

我们是从三个层面理解减税的必要性的。一是从政治学角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绝不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富民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目的与追求;二是从经济体制角度来看,市场经济必然是富民优先,以民间资本市场的活跃为前提;三是从经济管理角度来看,退一步,进两步,拉法曲线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美国肯尼迪和里根、布什、奥巴马减税起到的效果,都是事实明证。

从减税出发,既可以富民,又可以强国,何必非按照老路转圈呢? (作者系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为中小企业减税的利与弊

■ 李友志

最近,关于中小企业的的话题又热了起来,有媒体报道中小企业破产风潮起,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出现停工、停产甚至倒闭等现象,这是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首次出现类似的情况。

不同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当时只是美国的经济情况萧条,企业订单还是有。但是现在沉重的赋税,使得中小企业逐渐负债累累,破产似乎成了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的最终归宿。

江某是一家生物化学技术公司的财务总监,这家民营企业拥有200名员工,它一年要缴纳200万元所得税,300万元增值税,50万元营业税,35万元流转税附加,15万元的印花税、契税,还有330万元左右的社会保险费。共约930多万元的税费约占公司税前利润的48%。沉重的税费负担,让江某的公司举步维艰。这几年,税费一年一年地往上涨。

据统计,我国目前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为3.7岁,导致这些企业死亡最大的原因就是征收入缴纳的税费。目前我国对中小企业的划分仍沿用的是2003年的标准。很多企业正是由于相关法律的“真空”,每年都被迫多缴很多税款。

如果想让中小企业获得良好的生存空间,那么必须减免税,必须释放捆绑在中国中小企业身上的最重的一道“枷锁”。

减免税包括两部分,一是减税,二是免税。减税是按照税收法律、法规免除纳税人义务人一部分应纳税款。免税是对某些纳税人、征税对象进行扶持、鼓励或照顾,以减轻其税收负担的一种特殊规定。免税一般分为法定免税、特定免税和临时免税。免税是指彻底免除纳税人义务人应缴纳的税款,但是免税只对某些特别需要扶持的行业才会采取这种措施。

我们都知道,减税有利有弊。弊端就是国家会减少财政收入,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可能会受到影响。有利的地方就是缓解中小企业的资金难题,降低中小企业的财务成本等。利弊权衡,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

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微观层面的问题,他们主张通过减税刺激微观经济。著名的拉弗曲线告诉人们,如果税率太高,例如100%,政府实际上收不到税。当然在税收为零的时候,政府也收不到税。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减税给人们以更大的刺激,促使人们更多的投资,更敢于消费,更加利于资本的流动效率。

具体到中小企业生存这个问题上,对于中国的中小企业来说,减税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银行不愿把钱贷给中小企业。其实银行是企业,是货币的批发商,把货币提供给中小企业首先考虑的是第一还款来源的真实可靠性,而现实是中小企业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有预期,工资浮动成本难以控制,预期收益评估风险较大,从而不能够让银行觉得第一还款来源得到真实保证,融资难度由此变得很大。东南沿海破产的企业,绝大部分都是贷不到款、资金链断裂。

如果能够减免税,那么就增加了收入预期,从而保证金融机构第一还款来源的稳定性和资金安全性。减免税可以加大收益预期,促进民间资本的有效投入,有效促使中小企业的技术升级和转型,更加高效地投入竞争,维护市场的均衡状态。减税之所以会具有扩张效应,是因为税收是价钱的组成部分,在价钱必然的前提下,税额的多少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企业可支配利润的多少。税负的凹凸会直接影响利润率,从而影响到社会投资的积极性。

从短期来看,减税能够缓解中小企业面临的资金压力,为挣扎求存的他们助一臂之力,同时对财政收入确实有直接的影响;从长远来看,减税不仅能够帮助一些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提高社会投资的积极性,使人们更敢于消费,更利于资本的流动效率,最终也会带动财政收入的增加。

因此,为中小企业减税,是权衡利弊下的长久之计。

用工成本上升 为何工人日子仍不好过

■ 丁是钉

在美国建筑机械制造商巨头卡特彼勒公司将其在中国的挖掘机生产项目撤回本国后,阿迪达斯又宣布将在今年10月31日关闭其在中国唯一全资工厂。而这些企业离开中国大陆的原因都是用工成本升高(相关报道详见第三版)。

按道理讲企业用工成本上升了,就意味着工人的收入增加了,但是事实上工薪阶层并没有感受到工资上升所带来的生活水平提高,又一个悖论摆在了中国经济面前。

这个问题的原因就在于,从2008年以来的用工成本大幅度上升,实质上是因成本推动而形成的。这个成本就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由于物价的普遍上涨,工人维持其基本生存的费用大幅度提高,这使得企业必须向其支付更高的劳动报酬。又因为这个部分新增的工资完全被通货膨胀所消耗掉,所以尽管工厂增加了成本,但工人们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好处。

造成这个结果的根本原因,就是对冲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泡沫式增长方式——严重的流动性过剩导致了房地产价格逆势高涨,而居住成本的上升又推高了所有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因为所有的人都要住房子,所有的企业都要有生产和销售场所,无论是买还是租,只要房子的价格上升,势必导致所有产品的成本的相应提高。

对于房价暴涨,任志强的论调是——并不是房价太高,而是老百姓收入太低。就算我们认同这样一个逻辑的话,如果在没有劳动生产率提高作为支撑的前提下,大幅度提高工资必然导致剧烈的通货膨胀。当前的用工成本超经济承受能力的上升,正是高房价拉动经济增长论以及泡沫有益论所造成的恶果。

由于房价以及子女教育成本等基本支出的实际增加和消费预期增加,导致很多适龄劳动者有业不就,以致出现了“啃老族”和“用工荒”并存的现象。在一些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建筑等体力劳动的临时用工已经达到每天400—500元,并且要日结的水平,这样算下来月收入要超过万元。联系到前段时间成为坊间议论热点的“万元月嫂”现象,白领阶层在惊呼新一轮脑体倒挂时代已经到来。

企业用工成本上升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产品不再具有价格竞争优势,产品出口变得更加困难。与此同时,一些在大陆的外国投资企业也因成本的上升,纷纷把工厂搬迁到成本更低的越南、印度、柬埔寨等国,甚至是我们一直认为工资水平远远高出中国内地的美国。

工厂的搬迁和倒闭以及产品出口的困难,显然会影响到就业水平,也会使劳动阶层的生活境况更加恶化。一旦进入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中国经济的转型和软着陆将面临更严峻的形势,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杜绝经济的泡沫型增长,防止外部推动型的用工成本上升。

从现实来看,用工成本上升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尔夫死结。而通过减税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和中国经济的运行成本,以此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成本竞争力,是砍断这个死结的唯一办法。